

## 編者序言

陳佐人

美國西雅圖大學神學與宗教系副教授

正如奧古斯丁、路德或巴特（Karl Barth）的神學探究，加爾文研究是百科式、譜系式，甚至協奏為交響樂式的神學景觀，宛如「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不同或甚至相異的觀點，縱橫交錯，匯流成一條澎湃的神學源流，新生不息。

當然從思想史的角度來檢視加爾文主義，很難將嚴峻的日內瓦改教家聯想及圓潤清脆的轉軸撥絃聲，至少這是一般的見解。加爾文的形象似乎難逃其歷史命運：永遠是那位中世紀晚期「像鐵一般冷漠的邏輯學家」。但隨着現代性與後現代主義的論爭，思想家與史學家重新探尋與設定中世紀晚期的定位，由此亦掀起了對十六世紀的重新研究。路德、加爾文與茨溫利（Huldrych Zwingli）以新面貌重登現代學界的舞台。

二〇〇九年是加爾文出生五百周年記念，雖然周年慶典往往不是神學與歷史反思的最佳時機，但夾雜在無數觀光式的記念活動中，仍有少數具實質性的學術會議，帶着針對性的問題意識，嘗試以歷史的經緯度來對加爾文進行一種文化人類學式的「稠密描述」（thick description）。這些學術會議往往具備國際視野，嘗試突破加爾文主義的窠臼，以文化與歷史的制高點來擴大

我們對此位日內瓦改教家的歷史想象。事實上，近十年的加爾文研究已明顯地朝向國際化與非教派化的路線，從學術角度而言，此種「非主義化」的傾向是可喜之事。至少在美國的處境來看，主要的加爾文專家往往不單在傳統改革宗的重鎮，如普林斯頓或密西根州的加爾文神學院，更多任教於耶魯大學與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甚至是印第安納州的天主教聖母院大學（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此類代表著作是早年出版的《劍橋加爾文指南》（*Cambridge Companion to John Calvin*），該文集的作者來自英格蘭、蘇格蘭、荷蘭、瑞士與美國，有天主教與更正教學者，有來自賓夕凡尼亞州的威斯敏特神學院（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與密西根州大急流市（Grand Rapids）的保守加爾文主義者，也有來自普林斯頓神學院與芝加哥大學的加爾文研究學者。兼容了光譜系式的進路：有施萊爾馬赫派、巴特派、清教徒派、福音派、後福音派、純歷史派、政治學派的加爾文研究學者。同樣，本書的籌組與編寫是人文性、跨教派性與跨文化性的，務求使本書不是重複坊間與教會界的加爾文主義式的信仰言說，而是推進在漢語學界對加爾文與加爾文主義的文化式反思與理解。

本書是一本國際論文集，集中、台、港與北美的華人學者的作品，其中有尊治歷史、哲學、社會理論與神學的領域。本書探討分為三個領域：神學教義、社會理論與社會學式的宗教實踐，由此嘗試呈現加爾文作為一位神學家與社會行動家的雙向性畫像。

本書的兩位編者以文化史與思想史的進路來為本書提供引論，呈現出加爾文在神學、社會經濟與人文主義

的面貌。在神學教義篇，台灣神學院院長林鴻信教授的〈一切只為上帝的榮耀——加爾文五百周年〉亦以詳盡的專題與書目形式來為本書提供引論，此文幾乎包羅了近年英、美、歐陸加爾文研究的主要學府與學者及其著作，作者更與其中不少學者親自交流，表明西方學界與華人神學學術的接軌。香港浸信會神學院的鄧紹光教授的鴻文直接探討加爾文研究對建構漢語神學的意義，他提出以歷史方法來還原加爾文真貌，尋找那「不容屈就的加爾文」，其文末的「對漢語神學研究及神學教育的啟迪」特別值得一讀。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的李耀坤教授的〈聖靈的連結——加爾文對解決聖餐爭論的獻議〉是唯一探討聖禮神學的專文，此章對本書有畫龍點睛的價值，因近年宗教改革學者的共識均以聖餐論為大多數改教家（包括天主教的改革運動）的神學焦點。芬蘭赫爾辛基大學宗教學系的黃保羅教授重提〈路德與加爾文的稱義觀之比較〉，由此再次肯定加爾文神學是改教神學中的組成部分，整個宗教改教運動與其衍生的神學具有交響樂般的境界，對加爾文研究必須重現此種協奏式的音樂感。

本書的第二部分論及加爾文與加爾文主義的社會經濟篇是本書的明珠，這不單是因着近年的「韋伯（Max Weber）熱」，更是直接決定了我們對加爾文本人與加爾文主義的理解，因為加爾文的歷史遺風與林林總總的改革宗神學，其之所以引人入勝之處絕不單是其神學體系，更是因其在歷史長廊中的巨大衝擊。不論後世對《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中的「韋伯提綱」的是非論斷，加爾文、加爾文主義、清教徒、五月花號與西方現

代性已糾結成一混雜的複合體，當中固然有許多誤置的歷史迷思，但這不只是歷史與神學學者需要解惑之處嗎？上海師範大學謝志斌教授的〈從加爾文主義文化觀看漢語基督教研究的發展〉是我記憶中首篇由中國學者直接全面探討現代荷蘭神學家與首相克伊波（Abraham Kuyper, 1837-1920）的學術報告，由此表明作者在現代西方基督教社會理論的廣泛研究的廣度，亦代表了中國學界對當代西方基督教與加爾文主義全貌的探索。北京師範大學劉林海教授的專文探討「現代知識語境中的加爾文預定論」，從而推論資本主義與「信仰之確證」的內在關係。作者將其於人大的博士論文結集為《加爾文思想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雖是初試啼聲之作，卻是少數論加爾文神學思維的單本漢語著作，值得一記。最後亦是於中國人民大學完成研究的陳知綱博士，其報告〈加爾文經濟倫理及其現實價值〉的獨特之處是直接大量援引自加爾文的《基督教要義》（*Institute of Christian Religion*）與《聖經》注釋書，嘗試將一種原初的前現代經濟精神關聯於中世紀晚期的加爾文。

最後的「教會倫理篇」在研究方法論上具有示範性的價值。華東師範大學崇明教授的報告是〈加爾文的屬靈政治〉，但不是指基督教內部的宗教靈性或教會體制，此專文的關鍵詞是：上帝主權、屬靈國度、公民政府、屬靈政治、基督徒自由，可見此專文所探討的是作為公眾秩序的政治世界觀，以宏觀的角度來描述加爾文思想所引發的此世倫理。此兩篇論文均呈現了加爾文主義的現世性，借用崇明教授的結語：「以信仰為精神，以教會為核心，以政治為輔助，在共同體中實現個體靈

魂與行動的合一。」<sup>1</sup>台灣神學院石素英教授的〈加爾文的日內瓦與女性自主空間〉探討加爾文時期日內瓦城的離婚個案。石教授採用了檔案學的研究法，不囿於神學文本的論爭，探討文本空間以外的社會空間，呈現中世紀晚期日內瓦城的「平常百姓家」的立體歷史景觀。早期專治十六世紀歐陸歷史的學者已大量採用檔案學的方法來重新發掘路德、加爾文與茨溫利的歷史與社會學的處境，蘇黎世之於茨溫利，日內瓦城之於加爾文，再擴闊至大大小小的德國城邦之於路德的改教，這些都構成了更正教改教運動的大都會處境。近年學者更進入日內瓦城的檔案庫，再進一步檢視加爾文的「言」與「行」，思想家與行動家的雙重身份。由此觀之，日內瓦城大小風潮的重要性絕不下於加爾文的《基督教要義》與注釋，從此研究者必須同時解讀此雙文本：作為社會文本的日內瓦與作為神學文本的《基督教要義》與注釋。此種近似考古式的社會學與檔案學的進路，活生生地描繪了加爾文作為歷史中介者（historical agent）的角色，他既不是創造時代的風雲人物，亦不是任憑時勢而被造的英雄，正如大部分的典範人物，加爾文是具有明顯的主體意識，但卻常有時不與我的無奈感，因着深賴上主的護理與引導，他在艱險中奮進，承先啟後地締造了改教運動。在經典著作與檔案中的加爾文是一位文筆清秀的文人，思想清晰，內心滿有掙扎，卻滿懷清晰理念的複雜人物。

最後的「西方學者篇」不是作為結論，而是象徵對話的開始。雖然西方學者在加爾文研究上較我們早起

1. 見本書，頁 279。

步，但漢語學者一方面需借助他山之石，但另一方面亦需營造與參與此對話的過程，由此繼續維持加爾文研究的國際視野，並致力尋求與促進加爾文研究在當今中國學界與文化處境中的反思與共融。來自密西根州大急流市的加爾文神學院的穆勒教授（Dr. Richard A. Muller）是英美學界公認的加爾文研究的殿堂人物，他的這篇宏大回顧盤點式論文是由孫毅教授挑選，相信可以有助中國學者更仔細地了解近年西方學界的最新考察與動態。位於賓夕法尼亞州費城近郊的威斯敏特神學院的艾德格教授（Dr. William Edgar）早年游學於日內瓦大學，現執教於美國改教宗院校，他的獨特眼光兼具歐陸與美國色彩，在其專文〈加爾文主義與民主：西方神學與歷史處境的考察〉（Calvinism and Democracy: Theological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 Western Context）為我們展示了一幅寬宏的文化景象，甚至是在字裏行間帶有一點非西方中心式的語調，相信有心的讀者可以意會。由此而展開一場開放而互動、具建設性與創新的神學與文化對話，是為盼。

最後作為本書編者，在此感謝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的學術同道與編輯，特別是為我多番的拖延而致歉。深謝所有惠賜鴻文的中、台、港與海外學者，有些更是擋下手中的研究來特別為本學術文集撰寫。在此亦謝多位為本書翻譯與聯繫的學術界友好，多謝米勒教授多番致電郵來豁免其論文的版權費，特別深謝威斯敏特神學院的學術摯友，使我可以認識艾德格教授，促成以文會友之外的交流。

報》中申明：「我們堅決反對教會藉着設定政治原則來約束國家」。<sup>4</sup>如果上帝是存在於所有生活中，那他的臨在就不需要透過教會來展現；當然國家也不應成為偶像。但我們怎樣知道上帝對這些不同組織的旨意呢？上帝的旨意是經由創造而顯明，並不斷重申於《聖經》的啟示之中。另外歷史的漸進式發展，作為普遍啟示的一環，也不斷開展上帝計劃的完整藍圖。所以，「基督徒公民與政治家必須要以《聖經》啟示的亮光來研讀實際的政治生活，在實在的處境中，按照上帝的創造秩序，順從地回應上帝的旨意。」<sup>5</sup>

還有一嚴重的問題有待處理，就是人類墮落入罪惡之中。克伊波深信罪的嚴重影響，已遍及生活的每一層面。罪扭曲了一切，包括了人的心思，後果如同彈奏一斷絃的豎琴，完全失音。如果沒有罪，歷史與文化會完全發展，人類則得以享受個人與組織上完全的自由。克伊波與自由主義者不同之處在於二者對人內在之善的看法，自由主義者傾向於埋怨環境，而非以人心為一切壞事的起因；克伊波與天主教不同之處是他們對自然律的看法，後者相信非基督徒仍然在心內有道德律，人的理性會按照此道德律來分析世界。可惜罪比此二派人士的想像更為極端。

那麼，我們當如何在此罪惡世界中與非信徒交往？一方面在適當的時候，我們需要分道揚鑣或形成自己的機構，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學便是一例，其獨到處在於每一學科均要從獨特的《聖經》角度來教授。但另一方

4. Abraham Kuyper, 〈上帝的律令〉 (The Ordinances of God, 1873) , 頁 126。

5. James Skillen, 〈克伊波：抗衡革命計劃〉 (Abraham Kuyper: The Anti-revolutionary Program) , 載《社會的政治秩序與多元結構》 (Political Order and the Plural Structure of Society; Atlanta: Scholars, 1991) , 頁 237。

面，我們仍然有許多可以與非基督徒合作共處的工作，而此之所以為可能是因為加爾文主義的另一教義：普遍恩典 (Common Grace) ，縱然有墮落，一點也不減上帝的最高主權；他也滿有恩惠，即使非信徒不承認他的主權，神仍保守與促進真理。

克伊波在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學的就職演講中，提出其著名的領域主權觀念 (sphere sovereignty) 。他申辯每一領域均需順服上帝旨意，這些領域包含藝術界、家庭、科學界，當然也包含政府；此種「差別化」即表明了政治的多元主義。他所理解的民主，亦需要支持與維護互為對手的政黨的自由與權利。他反對從屬模式 (subsidiarity) ，就是將眾領域以垂直的方式組成階層的關係，讓國家掌管整個鎖鏈。相反地，他認為國家應當扮演一較為有限、平面的角色，需要與其他領域相互配合。

有了以上的討論，我們可得出甚麼結論？概括而言，可以有三方面的反思。第一，整體而言，加爾文主義者區分好與壞兩種的世俗化，不良的世俗化或世俗主義指向那些容許宗教被攻擊或衰落的觀點；許多人將二者混為一談，進而簡化地反對所有的「世俗人文主義」，雖然這類主義的確具有危險性，但加爾文式的領域區分卻不應該被忽略，因為良好的世俗化意味着，不論是教會或國家、或任何一個單獨的組織，均不能透過其領域而成為壟斷真理的媒介。「差別化」本身是一樁好事，例如：十九世紀法國的胡格諾派基督徒 (French Huguenots) 欣然接受拿破崙的新法，因它承認一有限度的教會，使他們可以在羅馬天主教的教會制度外，合法地教育自己的兒女，他們更進一步地期待能影響社會